

第3辑

新闻与文化传播

Xinwen Yu Wenhua Chuanbo Luncong

主 编 吴玉兰

执行主编 李军湘

论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3辑

新闻与文化传播

Xinwen Yu Wenhua Chuanbo Luncong

主 编 吴玉兰

执行主编 李军湘

论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与文化传播论丛. 第3辑/吴玉兰主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05-9198-5

I. 新... II. 吴... III. 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477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27)88324370 88320800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24.5 印张 419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ISBN 7-5005-9198-5/G·012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南财文化负责调换)

卷首语

风雨又一年。当《新闻与文化传播论丛》(第3辑)破土而出之际,晓南湖畔的点点柳绿,已将2006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装点得春意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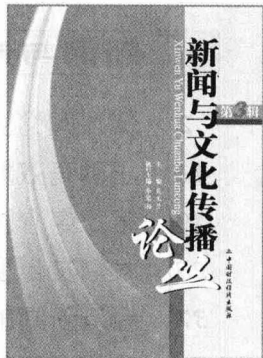
“总有一些事是要让我们皱皱眉头,是要让我们动动脑筋,是要让我们托着下巴想一想的。”崔永元在《保卫良心》访谈中如是说。本辑论丛即为2005年里,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老师们思考的结晶。

在2005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话题,一些前两年的热点亦继续得到关注。在本辑中,学者们关注传媒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及前沿理论,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有舆论监督的宏观问题,还有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等具体实务;有针对信息高速公路开创的因特网模式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媒介时代”的研究,也涉及“读图时代”引发的出版业的新革命。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使大众传媒从卖方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青年学者包国强倾心媒介营销课题,对于传媒品牌的营运又有了一番新见解。

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这里,我们推荐《重建文学史观念 探索文学发展规律——评世纪之交两部中国文学史》、《二十世纪以来杨万里研究回顾》、《传统的赞歌和反传统的悲歌——论沈从文与文学研究会的乡土文学之别》等三篇文章。作者分别为参加工作不久的三位年轻女博士,她们的文章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研究深入,在文学理论研究浮躁之风日盛的今天,其执着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研究的精神令人敬佩。

高等教育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动力与活力源自基础与专业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大学语文的困境与出路》、《现代应用文研究之反思》、《财经、政法类高校新闻专业现状、问题与对策》等文章,出自教学一线老师之手,他们的观点尽管不乏可商榷之处,但作者们倾注心血的新见解,相信能够对人文素质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学科发展带来些许新的启迪。

“溪回谷转悉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本论丛编委们愿意在“平等对话,沟通思想”的理念下,大胆创新,不懈努力。



李军湘

2006年3月

Contents

第3辑

334 中国当代艺术景观刍议

李 簪

学科发展与素质教育

342 大学语文的困境与出路

李漫天

351 财经、政法类高校新闻专业现状、问题与对策

黄 进

363 构建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四化”体系

余启军

371 当前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郭华桥

377 论“双赢”谈判

李军湘

Contents

第3辑

新闻与传播

- | | | | |
|----|-----------------------------------|-----|-----|
| 2 | 试述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 王梅芳 | 曾凡 |
| 12 | 正确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 | | 邱怀芬 |
| 19 | 第二媒介时代的主体建构 | | 姜金元 |
| 26 | 大众文化视野下对“读图时代”的思考 | | 吴玉兰 |
| 37 | 经济新闻的特点与从业者的素养 | | 李道荣 |
| 49 | 我国经济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
——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 | | 佟春玉 |
| 59 | 简论体育新闻的特征 | | 高婷 |
| 66 | 浅论如何改进配合式报道 | | 温强 |
| 75 | 新闻标题制作浅析 | | 殷修林 |
| 87 |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现代社会生活 | | 胡学军 |

中外新闻史

- | | | |
|-----|--------------|-----|
| 94 | 近现代上海晚报的历史分析 | 喻平阶 |
| 102 | 日、德法西斯报刊控制比较 | 刘兰珍 |
| 110 | 宋代邸报诗考证 | 高海波 |

传媒运作与广告

- | | | |
|-----|----------------------------|-----|
| 122 | 中国传媒集团品牌营运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 包国强 |
| 132 | 我国媒介经济学的内涵、研究方法及内容和意义 | 闻学 |
| 146 | 美国传媒业的集中化现象和数字化趋势 | 梁晓莉 |
| 155 | 电视经济专业频道经营策略初探 | 张力力 |
| 162 | 手机短信广告市场前景分析 | 苏新力 |
| 172 | 浅谈电视广告创意 | 李新林 |
| 177 | 电影的产生也需要产业园区 | 帅锦平 |

新闻与传播

XINWEN YU CHUANBO

试述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正确有效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
第二媒介时代的主体建构
大众文化视野下对“读图时代”的思考
经济新闻的特点与从业者的素养
我国经济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
简论体育新闻的特征
浅论如何改进配合式报道
新闻标题制作浅析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现代社会生活

256226161616

试述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文 王梅芳 曾 凡

舆论监督是一种现代观念,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产物。而中国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文化的排他性和封闭性都很强的国度。尽管中国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当我们强调通过舆论监督来呼吁一种新的价值秩序,并期望由此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时,我们不仅会遇到当代某种权力的抵御,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冲突。

所以,在提倡和开展舆论监督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中国传统价值观对现今生活的潜在影响。同时,把建立良好的舆论监督机制与改造或改善中国传统价值观合为一体,这样我们的工作将更具文化的建设性。

一、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一)天地君亲师

什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对应于我们所关注的舆论监督这个话题而言,则可以大大地简化,那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的背后则是一个伦理化了的自然秩序。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人心中最尊贵的一种存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史记·礼书》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解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自然万物,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代;没有家族,也就没有具体的你我;没有君师呢?没有君师,就没有人管理这个社会,没有人传授礼仪、文化,也就没有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组织严密的、为人类提供有效的生存保障和充分的文化经验的社会。所以,天地君亲师乃是使我们每个人成为“人”而

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觉的动物的先决条件。所以,旧时中国家庭的正厅里,几乎都供奉着写有“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的牌位。

读过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人,可能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唐僧师徒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镇元大仙的清居之所,爱惹事的孙悟空首先看到一件不合理的事,原来这个道观里没有供奉“天地君亲师”,而是清清爽爽地供着两个大字——“天地”。孙悟空因此嘲笑这里的“道士”太狂妄自大,怎么竟把自己看得比帝王还尊贵!而那仙童却冷嘲热讽地笑孙悟空有眼无珠,说供奉“天地”两个字还是师父谦虚呢,因为我师父自己就是“地仙之祖”!言外之意是告诉孙悟空:你还不配说三道四!这段故事说明,“天地君亲师”的观念至少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正如《史记》那段话所揭示的,“天地君亲师”这个词组即表示了中国人对自然事物和自然秩序的直观认识,又表明了中国人对现实社会政治结构的认可。按照“天地君亲师”所包含的内容来说,这个世界的秩序有三个层次:天,代表自然的秩序;帝王,代表社会政治秩序;父,代表家庭秩序。三者共生共补,异构同质。中国人必须在这三者的平衡协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导致了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出现,导致了自然规律的道德化、人格化的“天人和德”观念的出现,也就形成了从家走向社会、从父亲的儿子变成君王的子民,即社会特定角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化的人生道路。

从历史的发展顺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观念是发端于早期的自然崇拜,而完成于现代社会的典型崇拜。这其中,从自然秩序观念向伦理化的自然秩序观念的转换,完成于夏商周三代,成熟于汉代。这种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基本标志是:以帝王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礼为向导,以天地君亲为象征,以模式化的秩序崇拜为归宿。^①我们通常所说的“家长制”,其实就是这种观念秩序的具体体现,它是以“父为子纲”的伦理关系固化“一家之长”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与现代社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相冲突的。

(二) 在人群中做人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群体形态而存在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个人总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所以,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个人的价值与理想,都附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群体。从生到死,中国人一直是在人群中做人。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用一圈一圈的水波纹的形态来比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大大小小的人的圆圈里面。^②

① 曾凡:《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

2009.11.16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宗法观念下,人们生活在从“家”到“国”的圆圈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个人在本质上只是国家的附属品。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结构中,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是“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中国人最核心的人格理想是“忠君报国”。

由于封建制度下价值观的层次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人首先要忠于皇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次才是光宗耀祖,最后才是个人得到家庭、家族、乡邻的肯定。所以,在抽象的“国家”背后,人其实只是皇帝的附属品。

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中国人。在“文革”十年动乱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观念盛行,个体的存在已经完全消失,个人不但在政治结构中失去相应的地位,而且从精神心理的层面也被彻底清除,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被排除在正常的思维和行为之外。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精神背景中,舆论监督显然是毫无必要的。因为,社会是以混沌的整体状态存在的,社会利益的区分和古代一样是自上而下、一圈一圈的水波纹形态。因此,下层是上层的附庸,个人是集体的附庸,没有监督的主体,也没有被监督的客体。所谓的舆论监督为何而存在呢?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极左路线,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法错误。但是试想,如果在那时候我们有健全的政治平衡、文化平衡等方面的制约机制,有舆论监督的意识观念,有独立个体的生存意识和文化自主意识,我们是否能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观呢?

直至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改革引出思想改革的风潮,政治改革引出民主的观念,加之后更为深广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中国人才进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当我们今天畅谈舆论监督、畅谈文化多元化等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欣喜地看到,其实我们已经跨越了一段长长的历史。

二、官本位与人本位

官本位是一种诞生于封建制度下的思想观念,人本位是一种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思想观念。人本位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和挑战,是对封建文化的一种革命。

经过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平等,当代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人本位的观念,并把它转化为自己固有文化的一部分。从当下人们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尺度来看,人本位的文化更符合人类全面健康的发展。当现代社会形成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制度民主化、制度建设法制化的开放趋势时,官本位必然成为阻碍社会

发展进步的不利因素,它以文化的形态渗透于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我们来看一篇新闻报道:

“民告官”,“官”就缺席^①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只要是政府成了被告,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常常不见人影,空空荡荡,法院很多时候只能缺席审判。”谈起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官”拒绝出庭的怪现象,“两会”的法律界全国人大代表说,“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错误态度”。

据统计,人民法院5年来共审结行政案件近50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这些“特殊”被告常常不出庭。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国2000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名行政官员出庭。

全国人大代表赵仕杰说:“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公丕祥认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干部认为官与民的关系就是官管民、官为民,思想上很难接受被推上被告席的现实,觉得“民告官”破坏了自己的声誉,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如果还是一味地靠“缺席”来保“面子”、护“威严”,对法律的广泛推行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化进程都不利。

据介绍,近年来,各地披露的政府败诉事件越来越多,但这类审判结果执行起来往往难度较大,不少“被告”利用政府的职权与法律周旋,个别人甚至动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原告,不但使许多“判决”不了了之,也让老百姓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赵仕杰说,这说明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亟待进一步规范,同时也表明法院有能力通过行政审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用这篇随手拈来的报道作为例证,只是想说明官本位思想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官本位之所以至今仍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如此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政治管理机制,甚至作为社会评价体系,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出过中国人的生活。

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里,“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已根深蒂固。皇帝是老百姓的“天”,皇帝派出的官员则是老百姓的“父母官”,科举考试也

^① 陈芳:《大河报》,2003年3月11日。

是鼓励人们“学而优则仕”，整个社会评价体系都以当官为尊、以当官为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首先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提倡工农联盟，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后来又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口号，强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中心地位。这些思想和措施确实具有观念上的革命意义，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也显示出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口号和政策的提出只是告诉人们“当家作主”了，并没有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规定每一个人和“人民”的具体权利。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存在，因此现实生活中才有“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是为你服务的”这种典型的逻辑悖论。

官本位文化的当代形式，主要表现为长官意志、清官政治、奖励官员化。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过程中，官本位依然居于价值链的核心地位。由此可以看到，调整我们的价值判断体系，提高全民的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是多么迫切和必要。也由此可以看到，中共中央提出“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理念是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认识到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思想的积极能量。于是，“以人为本”不仅在政治、文化领域，而且在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也成为一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共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被作为国家、政府或地区性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工、关注贫富差距，在近两年成为舆论和官员最常提起的话题。在同样思想的指导下，一向以管理、监督和改造犯人为天职的监狱，自2004年起陆续出现了给犯人发工资、为犯人安排夫妻客房、为犯人在监区修建购物超市、让犯人回居民社区接受监督改造等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出现，所依据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理论探讨的结果，也不是自上而下的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逐渐增长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产物。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愈益发觉自身利益的特殊性，于是就愈加自觉地寻求自身利益。这种寻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一方面孕育和培养了人们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的关注，另一方面则培养了人们脱离官本位的政治思维，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社会各部分、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平衡发展、和谐共处。这种关注表现在文化层面，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权利和义务的肯定。随着“个人”从笼统的“人民”概念中日渐清晰、日渐独立，中国民众和政府共同培育了自身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譬如听证会制度的出现，譬如各级各类党政机关监督机制的出现，譬如人大、政协法律地位的提高等，都展现出中国法制建设、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而只有当这种进程被社会普遍关注、普遍接受的今天，我们

所谈论的舆论监督才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因为,舆论监督现在不仅是作为一种政治姿态或新闻题材而存在,而是已经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发展机制和社会平衡机制融入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应当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三、从观念冲突到利益冲突

舆论监督无论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机制、社会平衡机制还是政治管理机制,它的基础都是社会平等,即不同的社会阶层、团体乃至个体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每个阶层、团体和个体都天然地具有在社会中表达自己意愿、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出现整个社会的相互沟通、理解、妥协以及共同发展。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舆论监督才具有传递信息、表达立场和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功能。

显然,这种以平等为出发点的舆论监督机制,在本性上就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以帝王为中心、以官为本位、以伦理化的政治秩序为社会规范的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根本冲突。从表面上看,所谓舆论监督好像只是一种新闻写作、新闻报道的形式,但是,回顾舆论监督曲折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冲突。

(一) 观念冲突

舆论监督是不同的个人或利益群体通过舆论向社会传达自己的立场、情绪和要求,由此达到与其他人、其他群体共同分享社会权利的结果。这种思想和机制的前提是平等,即社会多数成员和多数群体都承认相互间的权利,承认社会是由平等或基本平等的权利主体构成的。无论个人贫富差异、权力差异、地位差异有多大,彼此都拥有共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并不因你我之间权力、地位、贫富、智愚的差异而改变。而且,每个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声音要求或推动社会作出某些改变,以使个人获得所期望的利益或权利。这就是舆论监督所代表的现代社会所接受的“平等”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多时候被表述为“人人生而平等”。

这种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冲突就是中国传统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古代的中国人是由清官代表君王来“治理”的,是皇帝的“子民”,所以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平等观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人所坚持的是“忠”、“孝”二字:一个对国、一个对家。

在当代,中国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在观念层面,我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跳出传统的等级秩序观念的思维方式。国家与个人之间如果不是相互独立的主体,那么领导者与老百姓个人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主体,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附庸,根本不存在“平等”的任何前提。这样一种个人身份的缺失,也就

导致了没有舆论监督的逻辑基础。谁监督谁呢?谁向谁表达自己的权力意志呢?谁向谁呼吁平等权利地位呢?都没有。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舆论监督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独立的社会主体,而在传统价值观中所缺失的恰恰是以个体状态出现的独立的社会主体。因此,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理解世界、对待世界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最根本的观念冲突就是:前者承认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后者否定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

(二) 利益冲突

如果说传统价值观与舆论监督的观念冲突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理论化的冲突,那么支持这种观念冲突使之难以化解的则是实际的利益冲突。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要求平等的,而传统价值观是肯定等级、层次、权力、秩序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人先天地被列入不同等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人专门是负责管理别人的,有人只能被别人管理。这就构成了社会中强烈的利益冲突。

在改革开放前,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其他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利益遭到全面压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允许表达,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利益冲突。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个人经济利益得到全面肯定,中国的社会改革文化改革也自然展开。在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的权利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同的群体、组织、行业、阶层由自发到自觉地追求自己的权利,社会舆论开始形成多元化的局面。多种声音,都有机会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如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传达给社会,舆论监督的机制也开始形成。但是,由于舆论监督的观念和机制会直接地削弱某些权力,所以有人不愿意让舆论监督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更不愿意它成为一种文化力量。

《大河报》2005年3月19日第4版有一篇署名付山的评论:

无知者无畏

3月12日xx“城管”因收费当街暴打与其争论了几句的农民工,此事经《大河报》报道后,公安部门已作出两名城管人员向被打的农民工道歉并赔偿医药费的处罚。但在问及这一事件时,该市创卫办副主任xxx对记者说:“记者的报道是干扰我们执法,公安可以把你们这些记者抓起来。你见过公安把嫌疑人反手扭起来的样子吧,就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把个人权利放在公共权力之上的例子。

从这一点上看,舆论监督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乃是公共权力与私人权

利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本来是公众的,由公众授权给政府或某些个人。获得公众授权的政府或个人则代表公众的意志来协调公共事务,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当我们用“公务员”来称呼政府官员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但是,权力具有扩张性,它常常表现为权力的越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当然不能直接决定和阻止权力的运转,那是属于民主的功能。但舆论监督是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的直接产物,其社会生活中推广普及,确实构成了公众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冲突。因此,要或不要、允许或不允许舆论监督的存在,说到底是一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这种博弈既不是公开的,也不是壁垒分明的,但却是广泛的、深刻的、持久的。

权力和权利的博弈虽然永远不会停止,但随着舆论监督的正常化和合理化,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以往看不到的现象。例如,现在各地都在召开“涨价听证会”,虽然有形式主义的嫌疑,但让老百姓走进权力决策过程毕竟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一些省、市现在允许市民旁听人大会议,一些立法机构在制定新法律法规时会在互联网上事先征求公众的意见,这些都是文化变革的巨大进步,是舆论监督逐渐被认可之后出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多次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要求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重视舆论监督,加强舆论监督,这就从政治上肯定了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

四、舆论监督是一种文化启蒙

说舆论监督是一种文化启蒙,这只是一种比喻,舆论监督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下,舆论监督常常代表着不同的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因此,舆论监督既不必然代表真理,也不必然代表多数,它仅仅代表不同的意见。但舆论监督却永远代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价值观。因此,舆论监督的存在和对舆论监督的容纳,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有一种正常的沟通机制,有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我们说舆论监督是一种文化启蒙,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含义,即它让我们看到沟通的可能,看到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相互并存、相互协调的可能,看到不同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

(一) 民众:公民的意识

作为文化启蒙,舆论监督对于广大民众的意义在于可以启发、倡导和强化公民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中国人只有君主与臣民、父母官与子民、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等上下尊卑——对应的概念,而缺乏公民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人只强调自己是“人民”而没有注意到自己是“公民”。这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公民”却没有正式的身份,隐隐约约之间似乎还有“资本主义”的嫌疑。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理论的模糊之外,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萌动,中国人的个人意识也渐渐被唤醒。这是因为,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与个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示范效应又让更多的人把个人利益放在比“人民”利益更重要的位置上。正是在个人意识苏醒、个人利益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孕育、滋长。中国人开始知道,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个人是拥有或应该拥有某些权利的。例如,农民呼吁解决卖粮难的问题,呼吁减少提留款、减轻各种税费问题等,都可以看做是对自身权利的呼唤。而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体对各自权利的呼吁,则客观地形成了舆论对社会秩序的有目的的呼唤。这种舆论对社会秩序的有目的的呼唤,日积月累渐次扩大,便逐渐形成了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有意识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渐诞生和成长的过程。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社会改革和舆论监督的深入,不仅仅是给每个人带来了具体的利益,更具深远意义的应该是启发和倡导了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如孙志刚事件、矿难事件、“非典”事件等种种不同的公共事件,在深化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地位的同时,也引导和教育了公众,使公众知道个人是国家的主体,个人是独立的社会存在,公民的权利在“社会公正”的框架内是应该并且可以得到保障的。

尽管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沟通方式已被社会承认，但是作为舆论监督基石的公众的公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朦胧阶段。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把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舆论监督的民主特性联系在一起。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一个缺乏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社会是不会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的。所以，无论是作为文化建设，还是作为政治文明建设，当下的中国都需要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更为普及的舆论监督，尤其需要具有明确公民意识的公众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二）官员：民主的意识

舆论监督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因此舆论监督的存在,对于官员的民主意识永远是一种推动力量。舆论监督对于官员权力的扩张和官本位意识是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官员都会透过舆论监督感受到民主的力量,并由此而提升自己的民主意识。

从舆论监督与官员的互动关系来看,推动舆论监督实质上意味着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尤其意味着对官员民主意识的培育。

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

需要更自觉、更深入的普遍的民主。当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缺乏对民主的主动追求时,首先培养官员的民主意识,让官员以开放的眼光看社会,以民主的精神对待多元价值观的出现,应该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得的选择。

也许是受到现实的诱惑,也许是受惯性的政治思维的推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政策。这种政策来自经济学界,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官本位色彩,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便显露出其特有的弊端,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价值取向的拜金主义。其背离人性化、人本主义和文化平衡的思维取向,引起整个社会的心理震撼和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强烈质疑。因此,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平等与社会公正的观念对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具有或可能具有比“效率”更深远的意义。由于世纪交替,这几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引发了中国社会舆论监督的阶段性热潮,相应地引起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成员对于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公民权利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注与追求。相对于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而言,公共权力管理者更应当强化自己的民主意识,应当借助于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自觉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把舆论监督放在传统价值观的背景中进行观察,是为了形成一种文化的对比,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舆论监督所具有的现代色彩。舆论监督是现代的,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平等观念。而传统价值观则是集体的、国家的和非个人的,它的基础是一切为了皇权、一切为了统治。所以,两种事物的冲突是两种存在状态的冲突。我们倡导舆论监督,其实也是为了建设一种现代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为了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因此,通过最近十年来舆论监督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及其为社会所带来的文化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舆论监督会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各类成员都愿意接受的、具有正面价值的、正常的社会功能。